

智库头条

编者的话：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资金过度进入虚拟经济等挑战,在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在中低端徘徊、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因

素,亦导致一些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盈利能力下降。中央在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中,已明确提出振兴实体经济的重大任务。如何纠正“重虚轻实”“脱实向虚”倾向,如何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等,都是今后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调研手记

培育实体经济
发展良好环境

万喆

我国是个制造业大国,3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与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紧密相关。但我国还不是个制造业强国,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占世界工业制成品的10%左右,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一方面,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仍以粗放为主,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靠受外部环境冲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环保压力逐年加大,制造业企业的运营压力与日俱增,同时一些地方对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片面追求,经济走向“脱实向虚”;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急剧上升,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外部市场均受到挤压。

在我国制造业面临内外双重压力的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将目光重新聚焦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等。西欧各国也纷纷出台再工业化计划和政策,英国政府公布新的振兴国家制造业的战略计划;法国政府在“新产业政策”中明确将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西班牙也制定了再工业化援助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通过法案或计划的形式促进制造业发展,同时以多层次、多方位政策部署进行系统性配合。首先是强化贸易保护措施。一些国家所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不断变化,涉及产品范围也不断扩大。比如,加强反倾销及“双反”调查力度;加强技术性和知识产权贸易救济措施;通过修改国际竞争规则或建立新机构来实施贸易保护等。其次,用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回归本土,主要利用税收或补贴等扶持方式。比如,美国取消了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的税务优惠,同时为回巢及高端制造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再次,加大高科技技术创新投入。欧美政府持续增加创新投入,并鼓励企业增加高端研发投入。

目前,我国也把手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积极推进。其中,激发出企业的活力和潜力,培育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非常重要。

从企业层面来看,应积极应对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实现向中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一方面,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的突破;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树立企业品牌意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同时,市场政策决策和制定者的导向尤为关键,应该注重培育适合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以及能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高效市场。首先,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强化制造业在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中的中心和主导定位。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要放弃短期利益,放眼长远,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和投射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提高治理能力,加强监管能力,挤压企业在虚拟经济投机行为的空间,促使经济“脱虚向实”。

其次,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要切实下功夫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一些额外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加大公开、公平力度,改善企业运营的整体政务环境,以法律为准绳,使行政政策和手段受到应有的约束和监督,实现宏观稳定和一致性,达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最后,夯实发展的基础条件。加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财力投入,通过完善制度使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融资变得更容易;重视职业教育,整合高校教育资源,强化职业工人的素质教育和实践培训;建立完善的沟通交流平台,加快信息交流;整合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资源,共同研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探索积极、有效、长期的合作模式。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本版编辑 梁笑语

实体经济
发展困境解析及对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下降、虚拟经济泡沫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经营环境趋紧、下行压力加大,出现了增长放缓、结构性矛盾突出、效益下滑等诸多问题。

首先,实体经济增速下降明显。从多项指标看,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下行态势。201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9%,为1992年以来最低。2016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虽呈现缓中趋稳的态势,但绝大部分是非主营业务的增长,能否持续有待观察。其次,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随着运营成本快速上涨,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亏损面不断扩大,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再次,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结构矛盾更加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供需结构不匹配,特别是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问题十分尖锐。近年来,一些新兴产业也有产能过剩的苗头和隐忧。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造成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

造成实体经济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加大。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健全、传导路径不畅通,大量流动性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存在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弃实投虚”的现象。特别是金融、房地产及其他虚拟领域的快速膨胀和过度投机行为,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境。虚拟经济投资时限短、回报率高,吸引大量资本流入,造成实体经济资金严重不足,实体经济“失血”现象突显。据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在6%左右,而证券行业、银行业平均利润率都在30%左右。与此同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在快速上升。据测算,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到2015年已超过140%。过高的杠杆率不但容易引发金融泡沫,导致金融利润率虚高,而且吞噬了实体经济资本。除金融领域外,我国房地产业的无序发展,也严重损害了实体经济发展。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长期过度看重房地产对GDP、财政收入的贡献,甚至一度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支持,在宽松的融资手段支持下,不仅使房价严重脱离国情、超出居民购买能力,而且导致房地产形成较高的盈利能力与财富积累能力,诱导实体经济资本大量涌向房地产,直接抬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成本,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

二是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刚性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随着工业化迅速推进,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正逐步减弱,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实体企业综合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突出表现在:能源原材料价格涨幅明显偏高;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实体企业出现招人难、用人难、留人难的问题;企

业税负重,据测算,企业已缴税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7.8%,其中应缴增值税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3.7%;融资成本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是实体经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这是造成实体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企业创新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由于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很多实体企业根本不愿意进行原创性研发;人才短缺、研发投入少,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受制于人,国际领先企业往往将销售收入的5%以上作为研发投入,而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只有2%左右;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有待加强,普遍缺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缺乏企业家精神,企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四是体制机制制约依然严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不完善,资源合理分配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各种门槛和壁垒犹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尚需改善,除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私人产权保护不够、法制环境欠缺、政府干预过多等老问题外,阻碍民间资本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仍然存在。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政策落实到位,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缺乏,难以激活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市场体系不完善,产业退出机制不健全,政府管制依然存在较强行政干预色彩,资源、产品和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的机制尚未形成。

五是市场需求明显减弱。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长放缓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也是造成实体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明显衰退,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贸易陷入低迷,外部需求总体偏弱。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呈现加速向实体经济回归的新趋势,一些新兴经济体则加紧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领域展开国际竞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逆势增长,使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国内市场需求约束明显强化,内需疲软已成为制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

振兴实体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快体制改革,激发实体经济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协同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营造商业氛围、健全信用环境、优化政务环境、完善法制环境。要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交易平台,发展各类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地区、行业、企业间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积极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投资渠道,推动社保资金、保险资金等投资领域的多元化,加快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建立风险资产管理和资信评估制度;要加快垄断行业市场开放步伐,积极推进垄断行业和领域产权、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支持社会资

本参与垄断环节的特许权竞争,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大力推动民间投资,在政策和资源配置上要给民间投资平等的地位和待遇,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实体经济创新能力。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特别是要加快培育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资源,打造创新平台,完善创新体系,优化创新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依靠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融资、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咨询等创业创新服务,实现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积极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发展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服务平台建设;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同时,完善创新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造就一批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家群体,培养一批由科技人员、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创新群体。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管,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坚持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视同仁,统筹规划,既要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提升作用,完善虚拟经济市场监管体系和制度建设,有序推进经济盲目发展,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尤其要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

要强化制度约束与规范,坚决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其一,要加强对股市监管,严厉打击内幕、投机行为,抓紧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新股发行和退市制度。其二,要规范金融市场行为,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实行集中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市场交易和清算制度,加强法规与监管体系建设,增强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透明度。彻底整顿理财产品市场,打击各种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对投资品市场交易的监测和监管,坚决打击过度炒作行为。其三,要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大力推进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加快以行政性调控为主到以经济杠杆调控为主的转变,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减少房地产无序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挤压。

要创新和改进金融服务,真正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其一,要加快构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能力更强、适用对象更广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积极推动金融业改革创新,实现金融行业从自我循环向服务实体经济的转变。其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租赁机构和综合服务平台。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和征信体系建设,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其三,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和金融租赁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引导资本流向那些发展前景较好的优质企业。要尽快取消“信贷规模管理”,赋予商业银行在合规框架下的市场化自主决策权,进一步增强信贷供给能力,优化信贷投向结构,更好地满

智库研究需要运营者的自述

——评《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

周湘智

流智库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要通过设置全球议程、影响国际舆论、广交各国朋友、影响他国政策、多与非西方智库交往等方式,塑造中国智库的全球组织力和话语塑造力。

同时,该书在智库建设的诸多方面都提出了务实观点。比如,该书认为,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应着力培养兼具研究能力、国际视野、行动偏好与传播认知的复合型人才,囊括高水平的政策公关精英、媒体传播人才、行政管理人、会务高手;在智库文化建设上,要强化主线意识、传播意识、产品意识、市场意识与受

众意识,把工作重点锁定在对《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贯彻落实上,锁定在开展有实质性、针对性的研究上;在介入决策上,应善于承担好“不应是政府办的、不需要政府办的、政府办不好的”事情上,充分介入到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中期建言、后期完善等过程;在外部环境上,则要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智库管理的统一标准,净化行业生态。

“春江水暖鸭先知”。智库中人最知道智库有什么、缺什么,智库作为最有研究能力的群体,在每天为政府出谋划策的同时,最有责任把自己研究好,自己把自己建设好。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发布

日前,《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中文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报告》以“政策环境创新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主题,立足中国智库发展现状,研析智库政策体系,结合中国改革创新对智库建设的实际需求,围绕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出对策建议。

《报告》认为,2016年一年间,智库与政府的互动日益增强,智库管理制度规范日趋完善,智库成果形式内容丰富,智库网络建设呈爆发式增长,媒体内容蓬勃发育。一些活跃智库不仅继续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密切追踪,而且能够先行一步预测热点并及时进行分析,部分活跃智库已具备一定的议题设置及传播推广能力。

《报告》同时指出,当前,中国智库在发展中存在“冷热不均”现象。一是上“热”下“冷”,国家层面对智库建设热情高涨,但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二是外“热”内“冷”,体制外智库建设热火朝天,但体制内智库推进改革

的积极性不高;三是库“热”智“冷”,相比于内容建设与质量提升,智库发展更热衷于形式传播与数量扩展;四是见“物”不见“人”,在智库内部管理上,智库人员的积极性尚未被完全调动起来。

对此,《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出台配套政策,建立完善智库登记、备案制度、探索智库服务政府采购制度、加大社会智库的扶持力度、健全智库成果的甄选机制、创新智库人才的流动机制、完善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制等,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健康发展。

《报告》同时公布了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从综合影响力、分项影响力、系统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和议题影响力五个方面进行评价,2016年综合影响力前十位的智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工程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等。(文/杨澍)

谈书论道

严格说起来,“智库热”是近三四年才兴起的事。面对中央和地方决策者的殷切期望,各大智库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迅速地学习和转型,成为各个研究机构的头等大事,实践中亦需要适合中国智库建设的理论出现。从这个角度看,近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的专著《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的出版恰逢其时。

该书提出,中国智库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键在于“伐谋”能力不足,“伐谋”应是智库的重要基本功能。一